

***Singing on the River: Sichuan Boatmen and Their Work Songs, 1880s-1930s.* By Igor Iwo CHABROWSKI.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5. 311pp.**

歷史時期社會底層勞工自己的聲音，在世界各國的文字系統中都難尋蹤跡，深入的研究不多。中國的情況同樣如此，然而，四川船工是一個例外。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勞動模式、文化傳統，特別是他們的勞動號子，給中國文人、西方旅行者、民族志學者和民俗研究者留下深刻而長久的印象。四川船工留下的相關資料足夠從勞動者的視角討論關於勞動的意義、大眾文化和日常政治等問題。查義高(Igor Iwo CHABROWSKI)的 *Singing on the River: Sichuan Boatmen and Their Work Songs, 1880s-1930s* (《河上呼號：四川船工與川江號子，1880-1930年代》) 一書，全面搜集川江號子的所有歌謠文本和音像資料，在充份辨析這些資料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從1880至1930年之間，四川船工如何應對現實處境，如何形塑和表達一個階層的文化認同，以及他們對周遭社會的適應如何展現20世紀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結構性轉變(頁1-2)。

船工包括傳統航運中被稱為水手、繆夫、曳手、水夫等各種各樣的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物中多用「船工」一詞，是將船夫按照馬克思對社會階級進行分類的方式定義為「工人」(頁2-3)。作者認為，把中國各省非工廠工人，如船工，作為工人階級的成員進行分析具有重要性，但其前提是跳出對20世紀初中國社會結構進行簡單劃一的、階級鬥爭的或經濟現代化的敘述方式和解讀模式。作者對四川船工的研究發現，在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之間建立的二元對立模式其實難以立足(頁7-8)。

勞動號子是理解船工社會群體的關鍵資料，提供了他們的喜好、審美選擇、道德價值觀以及關於社會秩序的認識和專業知識等諸多方面的資訊，被歸類為中國民間文化的一部份。作者認為，四川船夫的文化，就像中國其他底層邊緣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到來自讀書人、地方歷史傳統、社會經濟條件，以及民俗學者和民族志研究者等等各方的影響。四川船工的文化是精英與大眾動態互動的複雜歷史成果。從這種角度去思考大眾文化，我們才能真正了解船工的習慣，感受他們回應現實處境和自身地位的特殊方式(頁18-19)。

作者發現，直到抗戰結束，川江船工都一直被視為「沒有歷史的人

群」。晚清以前，官員、地方文人和社會精英對於研究和記錄鄉土文化和地方民俗都沒什麼興趣，更不會注意傾聽底層的聲音。查義高主要利用《中國歌謠集成·重慶市卷》（聶雲嵐、彭維金、賀大舜主編，重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川江號子》（段明、胡天成主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巴渝民間文學薈萃》（金祥明等主編，重慶：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收錄的船工號子，結合地方史志、民國年間的檔案和外國人的觀察記錄（如 Archibald John Little，Isabella Lucy Bird，Friedrich Weiss，George Raleigh Gary Worcester 等）、音像素材（如 Friedrich Weiss 錄下的 1911 年喊號子的聲音）來辨識傾聽船工的聲音（頁 19-47）。作者非常謹慎地對號子這一核心資料的來源與解讀方法進行辨析，認為在被民俗學者採集並轉化為研究對象、進行分類和闡釋之前，號子是船工勞作時發展出來的勞動工具，是一種協調船隊成員合力拉繃拖船的方式，並且認為，在直接引用號子的歌詞之前，有必要對中國民間傳說和民歌資料搜集、分類整理和研究的學術史進行回顧，這有利於理解和合理運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文本文獻。

作者認為，要恢復這些傳統民歌的內在豐富性和風格的複雜性，需要從文本分析的實踐中剝離出民間文化的真實面貌，重構很多已經斷裂的傳統。以《中國歌謠集成·重慶市卷》為例，收錄出版的資料選取的是在文本上、音樂上和道德價值觀上都出類拔萃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中，如關於宗教儀式、民間信仰和妖魔鬼怪的內容，往往被編輯和處理，展現出來的是一個純化而政治正確的版本。

在辨識船工聲音的文本分析實踐過程中，作者總結道，船工號子就像大多數的口頭藝術，只保留了小部份的碎片，我們再沒有機會聽到他們大多數的表演，也無法對版本進行嚴密的分析考證。但我們可以放心的是，船工號子的音樂和抒情結構促成了不同程度的輔助記憶，內嵌在歌曲中的記憶方法保留了號子的原始性（頁 143-144）。

此書除導論和結語之外，由兩個部份組成。第一部份「背景」包括兩章。第一章「號子的社會起源：川東工人階級（1880-1930 年代）」是在四川省社會經濟歷史的大背景下，對四川船工的來源、勞動和生活狀況進行詳細研究。船工是川東非農業勞工的最大群體，也是川東社會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到了 1920 年代，汽船開始取代船工掌控從宜昌到重慶這條重要的船運路線，導致大量船工失業而更加貧窮。

船工是一個多樣化的群體，包括船主、引航員或舵手、繃夫、廚師和監督。各船船員的規模、組織方式和地理分佈上區別很大。就業與薪酬在川東

特別是重慶與哥老會（或稱「袍哥」）、船行老闆、船幫老大密切相關。作者認為這些船幫大多數是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建立，幫頭或老大每年在河神鎮江王爺的誕辰慶典活動中選立，大多數船幫通過舉行這種古老的儀式統合起來（頁71）。

第二章「來自河上的聲音」解說了號子如何能夠適應四川大江小河的自然水文環境。在行船時，領歌和合歌之間呼喊交流，領頭的繙夫與其他繙夫之間也進行應答。船工通過喊號子來協調整個團隊的工作節奏，避免危險事故，同時減輕勞動負擔（頁130）。

第二部份「社會空間、工作、性別與自我認知」包括三章，從文化史的視角深入解讀船工號子的內容，討論四川船工如何認知他們生活工作的物質世界和社會關係，以及如何與之互動。

第三章「繪製河流地圖」檢視了那些號子所描述和展現的川東社會，特別是區域性大都會重慶。作者指出，船工頭腦中的地圖，在空間移動中被記住和用以導航，以號子的形式口頭傳播，號子的內容囊括河流和城市的詳細資訊，為省內安全航行提供一張不可或缺的地圖（頁137-138）。作者認為，這些民間歌謠有兩個特色：首先，這些號子是成功的記憶工具，幫助船工記住川省複雜的河流系統。其次，號子提供了船工自己對社會和文化的陳述。號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對地點、貨物、歷史典故、神明、神話的選擇或排除，這些都與我們理解船工文化緊密相關（頁163）。

第四章「我歸何屬？——四川社會的自我認知和卑賤工作」分析船工如何認識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的社會地位。作者指出，號子不僅表達了船工對船行老闆和秘密社會的抵抗，而且唱出他們作為社會底層悲慘的生活，甚至死無葬身之地等與死亡相關的淒慘內容。在作者看來，船工們對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有批評，在哀歎和嘲笑自身社會地位的同時，船工也表達對自己的工作和船員之間手足情深的驕傲。

第五章「關於女人與愛情」，關注的是船工號子中處理與女性的情感關係的類型。四川船工在號子中表現的自我認知是「標準的男性」，雖然他們大多數沒有建立家庭，也沒有獲得儒家規範定義下的社會尊重。船工直接或借女性之口宣稱自己不僅強壯、有吸引力，但同時又是膽怯而懦弱的，無力與女性保持持久而受社會認可的關係。

作者不僅為生活在底層的四川船工群體撰寫了一部細緻全面的社會文化史，還在文獻的辨析和使用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方法論，並提出對現代化和階級鬥爭敘事框架的挑戰，這些是其精彩之處。然而，該書也難免存在一

些瑕疵。如作者對巴縣檔案、四川地方的民國報刊和地方史志資料的挖掘和利用還不夠徹底；又如邱澎生關於清前期重慶船運和船幫的研究對於四川船工社會組織的歷史認識是非常值得參考的（邱澎生，〈國法與幫規：清代前期重慶城的船運糾紛解決機制〉，收入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75-344）；最後，對於船工的宗教信仰、船幫和船行的宗教儀式及相關社會組織如「袍哥」的考察，仍須有更深入發掘，以展現更具體的歷史圖像。

陳瑤

廈門大學歷史系

***Die Bürokratie Des Terrors: Eine Exhumierung.* By BARBARA LOFTUS. England: Scrutineer Publishing, 2013. Bilingual, 144pp.**

Die Bürokratie Des Terrors: Eine Exhumierung 是英國著名具象畫家 (figurative painter) 芭芭拉·洛夫圖斯 (Barbara Loftus) 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全書英、德兩國文字對照排版，繪畫作品插圖與檔案史料都十分豐富。書的封面左半部份是一片深紅色，右半部份是一幅繪畫，畫中兩隻男人的手在傳遞着一隻瓷質玩偶，並半露出一隻男款皮靴。在這種神秘的主色調旋律下，封面雖簡潔但絲毫不失莊重。正標題（恐怖官僚）與柏林「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博物館的主題近似，都是關於納粹血腥暴政內容的呈現，而副標題是對當時恐怖官僚行為的「剝露」。剝露實際上是戲劇藝術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是讓人物在劇情進展中，在特定的戲劇情境中，做自我暴露，剝掉用來掩藏自己的本質的另外一個本質的假像，還原其本來面目（參閱寧殿弼，《當代中國戲劇家論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頁134）。

該著作是作者芭芭拉為了紀念與獻予已逝母親——希爾德嘉德·洛夫圖斯 (Hildegard Loftus née Basch, 1915-2007) 的禮物。這是她通過收集多方面的零碎資訊所創作出來的一本舊柏林生活情景的紀念冊或回憶錄，並配以在歐洲的一次巡迴藝術展覽。她將檔案館發掘出來的種種資料進行了整合與物化 (materialize) 處理，重新復原了曾居於柏林的德裔猶太人母親及其家族在「恐怖官僚」籠罩下的「命運之章」，並以這一次創作個案展示出的音像和文字